



On Sports as American New Frontier and Safety Valve between the 1890s and 1920s

XU Guoq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of 1890 and other data, the American traditional frontier ceased to exis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the meantime, the nation was united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afte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by the late 1890s became a superpower economically. How to keep American civilization dynamic and maintain the fighting spirit of Americans had become a major focus in a dramatically changed nation. The challenges were even more pressing when the nation faced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changes both externally and internally. American elites and general public eventually turned to sports as the new American frontier and safety valve and used sports to promote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broad and strengthen the n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at home.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how sport was empowered with such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also aims at bring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merican history and American expansionism through the lens of sports. Conventional wisdom usually thought Americans did not seek world hegemony until the Second World War. Yet from a sports perspective, we can clearly see a pattern that Americans were determined to Americanize the world culturally and economically by promoting American values and interests on the world stage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Sports served a platform and tool for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ism. Through study of American obsession with sports since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we can also find a clear and strong pattern for the last one hundred plus years, namely, American society has been consistently obsessed with manhood and fighting spirit. This largely ignored yet important pattern might be a key for helping us to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foreign relations and address issues such as whether America is declining and whether it is still an expansionist nation.

Keywords: Sport, New Frontier, Civilization, Safety Valve, American expansionism

Author: Professor Xu Guoqi received Ph.D. in history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most recent single authored books include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ympic Drea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rofessor Xu also publishes widely in Chinese. His current research includes *The Idea of China? A Shared History* (under contract f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w Chinese Play: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and idea of China* (in Chinese); *Sports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n English and under contract fo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Modern China: A Brief History* (in English and under contract fo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試論1890年代到1920年代體育如何成為美國的新邊疆和安全閥

徐國琦

[摘要] 根據美國1890年的人口普查等統計資料，美國傳統意義上的邊疆在1890年代已不復存在。在通過內戰實現真正統一以及成為經濟強國後，如何打造能夠讓美國文明及文化繼續充滿活力和奮發向上、開發新的市場和幫助轉移國內矛盾和巨大能量的新安全閥成為美國社會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尋找美國人新的邊疆成為19世紀末以來美國人的重要議題和十分糾結的問題。本文分析美國人如何在面臨美國傳統邊疆消失之際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之初，把體育打造為美國新邊疆和安全閥，並藉體育重新打造美國國家認同以及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向全世界擴張自己的文明、文化、價值和美國夢。

本文的另一個重要出發點是透過體育角度重新解讀美國歷史和重新認識美國向外擴張的歷史進程。本文認為，從體育角度透視美國歷史軌跡可以清楚地幫助我們認識一個一直被忽視但十分重要的美國社會現象，即美國從19世紀末以來一以貫之地通過文化、文明特別是體育弘揚美國價值及對外擴張。體育是美國的巨大軟實力的體現和平台。借助體育視野，我們可以更加清晰的認識為什麼美國社會長期以來對男子氣概、陽剛之氣、尚武精神耿耿於懷和重視。認清和理解這些我們經常視而不見、長期忽視但極其重要的現象，無疑為我們全面分析有關美國的歷史、美國文明、美國是否衰落以及美國擴張等議題，提供了一個更為透徹和客觀的視野。

[關鍵詞] 體育 新邊疆 文明 安全閥 美國擴張

[作者簡介] 徐國琦，安徽樅陽人。1999年獲哈佛大學歷史博士學位，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美關係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體育視野下的中國史和美國史、中外共有和跨國的歷史、作為概念史的“中國”等。代表性英文著作有『中國與大戰』、『奧林匹克之夢』、『中國人與美國人：從同舟共濟到競爭對決，一段被忽視的共有歷史』、『亞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個共有的歷史』、『一戰中的華工』等，中文著作包括『難問西東集』、『邊緣人偶記』、『為文明出征』等。

關於美國例外論和美國何時走向海外擴張不歸之路的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在中國的美國史學者中，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美國對是否成為世界警察一直躊躇不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終於義無反顧全面走向霸權之路。^①當然如果我們從外交層面來說，美國直到1941年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決心成為維持國際新秩序的領袖，這一觀點固然不錯，但從文化、經濟、貿易等方面、特別是體育角度而言，美國無疑早在19世紀末，即公開赤裸裸地展示“天下英雄，捨我其誰”的野心，並通過體育運動向全世界擴張美國夢。體育視野從而幫助我們從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美國的擴張之路。不僅如此，體育視野還為我們認識1890-1920年間美國人如何從19世紀末以來，一步步把體育打造為美國的新邊疆和安全閥，提供了全新的解讀。本文的立足點和側重點不是分析美國如何走向擴張之路，而是解讀體育如何成為美國的新邊疆，探討從19世紀下半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如何通過體育把美國文化、文明價值向全世界擴張，以及如何藉助體育重新打造美國夢、美國國家認同以及民族自信心。

一 美國舊邊疆的消失與美國人尋找新邊疆

在解讀體育成為美國新邊疆之前，有必要先簡單介紹一下美國的傳統邊疆。美國從18世紀末獨立後，從東部的13個州一步步向西發展，期間不斷侵吞美國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土地，以及從墨西哥人手中搶奪領土和通過向法國和俄國購買領土等多種手段，到19世紀中葉成為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幅員遼闊的國家。由於廣袤邊疆的存在，美國人直到19世紀末無需像歐洲傳統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向海外或國外開疆拓土，而是開展西進運動，致力於美國國內的建設。並且，美國人以門羅主義的名義阻止外國勢力捲入美洲事務，一舉把北美實質上變成自己的禁籬。^②傳統邊疆之存在，一直是緩解美國內部矛盾及尋找個人新起點和再出發的安全閥，並提供吸收美國不斷發展和壯大的能量和擴張的向心力。後來成為美國著名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就大力強調邊疆文化對美國人的正面和積極影響。羅斯福1884年開始身體力行塑造自己邊疆人的角色，並著書立說，宣揚邊疆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其四卷本『逐鹿西部』（*The Winning of the West*）一書，該書的第一卷於1889年出版，最後一卷在1896年問世。^③羅斯福宣揚邊疆的存在是美國的獨特優勢，因為邊疆，美國在立國的第一個一百年得以立足及生存下來並可以在其進入第二個一百年時繼續發展，美國的文明才充滿活力和生機。但根據美國1890年的人口普查等統計資料，美國傳統意義上的邊疆在1890年代已不復存在。美國已經不再有無主之廣袤邊疆。其實從行政上來說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之間的發展之速：1889年，北達科他、南達科他、蒙大拿、華盛頓分別加入聯邦成為新的一州。1890年愛達荷、懷俄明也成為新州加入聯邦。也就是說，12個月之內，6個新州加入聯邦大家庭，速度之快，美國建國後前所未有。美國本土到1890年就有44個州了。到1912年，最後四個州加入，美國本土的48個州全面建立。在國家統一、以及成為經濟強國後，如何打造能夠讓美國文明及文化繼續充滿活力和奮發向上、尋找新的市場和幫助轉移國內矛盾和巨大能量的新安全閥成為美國社會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換句話說，如何尋找美國人新的邊疆成為19世紀末以來美國人的重要議題，也是美國人當時十分糾結的問題。

本文最初版本是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榮任2022-23年度余英時歷史講座而寫。2023年5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作「體育與美國的新邊疆」報告前後，得到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張瑞威教授、歷史系教授卜永堅、文學院前院長梁元生、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院長陳新安教授、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及眾多學界友人的批評指正和鼓勵，謹致謝意。『南國學術』雜誌匿名審查者的批評指正對拙文進一步修改，貢獻良多，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楊鈞量先生幫我審定注釋格式、校正文字，功不可沒，在此一併感謝。

- 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應為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該書於2023年獲選國家翻譯出版基金叢書系列，不久應有英文版問世。
- ② 鑒於英國在美國內戰中支持南方，特別是為南方建造了對北方造成極大傷害的「阿拉巴馬號」軍艦，美國內戰後曾考慮攻打英屬加拿大，以示懲罰，迫使英國讓加拿大於1867年自治。
- ③ Theodore Roosevelt, *The Winning of the West*, 4 volum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89-1896).

最先全面和從理論高度解釋傳統邊疆歷史意義的是美國當時初出茅廬的年輕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①1893年在芝加哥舉辦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特納宣讀了一篇歷史論文，強調邊疆在美國發展和歷史中的重要意義及對外擴張對美國歷史進程的重大價值。特納認為，美國之所以與其他國家的歷史發展不一樣，根本原因是美國有西部運動，有廣袤的自由土地的存在。“迄今為止，美國之歷史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向大西部殖民的歷史。大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及不斷減少的過程與美國人不斷向西發展的進程，就是美國的發展史。存在在各種機構、憲政及其修訂背後的某種至關重要力量，為它們賦予活力，並助其與時俱進”。這一至關重要的力量就是邊疆的存在。特納認為美國歷史發展關鍵不是大西洋，而是廣闊的西部。邊疆孕育了美國人民的自由精神、不屈不饒的奮鬥意志，並成為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美國自殖民地以來到1890年代的歷史發展的軌跡和進程與邊疆和自由土地的存在息息相關。在這篇後來受到廣泛關注的論文中，特納宣稱，隨著邊疆的消失，美國歷史發展的第一階段也因此終結。^②顯然，特納不僅以歷史學家的特有的敏感，意識到邊疆的重要性，而且特納實際上在呼喚新的邊疆。如同其邊疆學說一樣，為後傳統邊疆時代出謀劃策，指點迷津。^③

特納的邊疆學說一出爐，羅斯福立即名正言順地成為其知音。這位撰寫過前面提到的『逐鹿西部』一書且後來在國內、國際呼風喚雨的政治家，對當時發生在美國與世界的變化有極其深入的觀察力和影響力。當特納的邊疆學說問世後，羅斯福給這位同樣年輕的歷史學者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充滿讚譽的信件。他寫道：“我認為【你的邊疆理論】把近來社會上可以聽到但缺乏綜合分析的一些想法予以系統化，上昇為一流觀點”。羅斯福告訴特納其邊疆理論的即時問世對他正在寫作的『逐鹿西部』的第三卷極有啟迪。^④兩人無疑惺惺相惜，羅斯福欣賞特納的邊疆學說，而特納對羅斯福的著作『逐鹿西部』也投桃報李，讚譽有加。在其第四卷於1896年出版時，特納撰寫過很正面的長達六頁的書評，雖然對羅斯福的著作沒有利用多方特別是歐洲檔案資料有些微詞，但總體來說，他高度讚賞羅斯福皇皇四卷本巨著對美國歷史研究做出貢獻良多 (a real service to our history)，特別是對羅斯福重視邊疆的貢獻“令人崇拜 (an admirable thing to do)”。^⑤特納還在流傳甚廣的大眾雜誌『國家』(The Nation) 上撰文介紹羅斯福的『逐鹿西部』。這讓羅斯福甚為感激。他寫信給特納致謝說，能夠得到該領域“大師 (a master of the subject)” 的評論，他“非常開心 (much pleased)”。^⑥

雖然特納解釋了傳統邊疆的重要意義，認為傳統邊疆的存在是美國一百多年來發展的安全閘，但什麼能夠取代消失的傳統邊疆並成為美國社會的新安全閘呢？1890年傳統邊疆的消失，正好發生在美國社會、文化、經濟及國際政治經歷翻天覆地的巨大轉型期間。美國的歷史從立國一開始就是一部擴張的歷史。文化上如此，經濟上如此，領土增長上更是如此。19世紀60年代後更是通過一場血淋淋的內戰，一舉解決南北雙方政治對立問題，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美利堅合眾國，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到19世紀末，美國通過內戰後重建、橫跨東西鐵路的完成，美國

① 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於1890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歷史博士學位。該大學是美國第一個以德國現代研究型大學為模式所建立的研究型大學。因邊疆學說成名後，1910年他離開威斯康辛大學前往哈佛大學歷史系任教直至退休，培養了不少傑出弟子。

②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pp. 1-38.

③ 中國學者最早系統性研究特納邊疆學說的是南開大學著名歷史學家楊生茂教授。早在1980年代楊先生就寫過詳細分析文章。參見楊生茂：『探徑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19-68頁。

④ 原文為“I think you have struck some first class ideas, and put into definite shape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hat has been floating around rather loosely.” 見“February 10, 1894, to Frederick Jackson”, In H. W. Brands, e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ress, 2001), pp. 86-87; 參見John Mack Faragher, *Rereading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30.

⑤ Turner’s Review on *The Winning of the West* by Theodore Roosevelt,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1, 1896, pp. 171-176.

⑥ “Letter to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November 4, 1896”, in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04), pp. 91-92.

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統一體，並一躍代替英國成為世界上頭號經濟大國。19世紀下半期以來，美國正經歷偉大轉型：從農耕文明向城市化、工業文明過渡，由地區大國向國際強國過渡。在文明和文化方面，美國獨立100多年後美國人顯然對自己的文化、文明、制度充滿自信，認為美國有責任在文明和文化方面引領和幫助全世界。

巨大轉型當然也帶來強烈陣痛及失落感。19世紀末時期的美國無疑面臨著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就在美國國內出現翻天覆地的巨變之時，國際情勢也發生質的突變。日本和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正力圖瓜分世界，並壯大自身的影響和力量，對立陣營隨時會兵戎相見，發生大規模戰爭。這種在1890-1920期間美國與世界同時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讓美國人一方面對外充滿自信，但另一方面對內又充滿疑慮和恐懼。如同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赫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所寫的，美國人的集體政治思維經常出現歇斯底里狀態和經歷巨大心理危機，這種歇斯底里的狀態和心理危機在19世紀末的美國尤其突出。^①克里夫蘭總統（Stephen 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在1893年因為委內瑞拉糾紛差點同英國大打出手就是因為舊邊疆的消失伴隨的1893年經濟危機的一個對外政策反應。1898年美國人終於捲入戰爭，同西班牙開戰，無疑也是在轉型時代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能反應。鍍金時代的出現，尤其讓不少美國人對美國的未來及發展趨勢產生憂慮和不安，擔心鍍金時代的美國人過分崇尚舒服生活，紙醉金迷，導致美國缺乏活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伴隨大機器時代、都市化、工業化的來臨，更讓不少美國人擔心美國可能因過度文明和生活的閒適導致美國人像古羅馬人和中國人一樣開始墮落、缺乏活力。美國著名戰略家阿爾佛瑞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在19世紀末就宣稱，古羅馬帝國之所以衰落是因為它拋棄了“強壯陽剛之氣的衝動本能（strong masculine impulse）”而自甘墮落到追求舒適、金錢和安逸的平淡生活（degenerated into that worship of comfort, wealth, and general softness, which is the ideal of the peace prophets of today）。^②馬漢呼籲美國人要奮鬥，要鬥爭，敢於在到處充滿競爭的時代亮劍和勝出。^③羅斯福與馬漢一樣，強烈鼓吹奮鬥的人生。他當時非常鄙視中華文明，認為中國人是墮落的民族，缺乏陽剛之氣。他在19世紀末就警告美國人，如果我們像中國人一樣自甘認輸，缺乏進取心和尚武精神，美國也會被淘汰，被他國勝出。^④1901-1908年擔任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堅信美國男性和整個美國民族應該透過艱苦卓絕的努力來實現自我和民族價值。羅斯福宣稱：“偉大意味著為國家和我們男人自身而戰”。羅斯福鄙視不夠堅毅的男子和民族。在他看來，“我們尊重那些真正像男子漢的男人——正視困難，克服困難，而且以此培養自己的孩子”。羅斯福甚至指出：“如果我們未盡到自己的責任，就會像中國那樣淪為弱國”。^⑤羅斯福告誡美國人：“所有偉大的、如主人般發號施令的民族都是有強烈鬥爭精神的民族；而一旦一個種族失去頑強拼搏的美德，它便失去了傲視同儕、與最優秀的夥伴平起平坐的權利”。^⑥西奧多·羅斯福希望美國人成為世界上“最強壯和最勇敢的（the strongest and boldest）”人民。^⑦他在1899年苦口婆心地告誡美國同胞，美國不應追求安逸的生活，而是應該提倡奮鬥的人生。20世紀即將來臨，如果我們不乘勢而為，奮發進取，美國就會在優勝劣敗的競爭中失敗。^⑧在羅斯福、馬漢等人的影響下，導致不少社會精英階層同樣鼓吹美國要奮發有為，在國家和文明競爭中，應

① 參見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63);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quoted from Clifford Putney, *Muscular Christianity: Manhood and Sports in Protestant America, 188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2.

③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5), p. 162.

④ Theodore Roosevelt, *Strenuous Lif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01), pp. 7-8.

⑤ 引自Kristin L. Hoganson,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panish-American and Philippine-American W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44-145.

⑥ Th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2.

⑦ Mark Dyreson, *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Sport, culture, and the Olympic Experie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 59.

⑧ Theodore Roosevelt, *Strenuous Life*, pp. 21-22.

成為成功者，而不是被淘汰和任人宰割的對象。^①

隨著傳統邊疆的消失，面對大變化時代，各種思想、思潮、理論在美國粉墨登場。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天定命運等在19世紀末甚囂塵上，吸引了不少信徒。歷史學家霍夫斯塔德認為，19世紀末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在美國得到極大關注，因為美國社會在優勝劣敗的自然進化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一方面美國人在19世紀末開始熱衷把世界美國化的心態與當時美國社會接受盛行一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關；另一方面，社會達爾文主義又導致美國人出現各種憂慮和不安。^②就在所謂傳統邊疆消失的同時，馬漢立即在1890年出版了影響深遠的海權著作『制海權在歷史上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此後又在1897年發表了另一部著作『美國與制海權』（*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馬漢強烈建議美國要追求強海軍戰略，與其消極自衛，不如跨洋過海，馬漢認為，誰控制海洋，就能控制世界。他鼓吹美國要跨洋過海，將強大的國力同控制海洋連在一起，把海洋打造為美國的新邊疆。^③但馬漢並沒有成為美國新邊疆學說的代表。這項榮譽落到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歷史學者的身上。

特納的邊疆學說也好，羅斯福的邊疆神話和馬漢的海權理論也罷，只不過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社會巨大轉型時期的各種思潮和學說而已，反映了當時正經歷巨變時代的美國社會呼喚新的國家走向和外交政策的緊迫感和焦慮感。只是特納、馬漢、羅斯福等人的呼籲、主張及觀點在當時受到更多關注而已。實際上，鍍金時代的出現，傳統邊疆的消失，從地理上和文化上提醒美國人一個時代的更替和新時代的來臨。新時代需要新邊疆。在19世紀末，美國人面臨國內大轉型和大變革和國際情勢發生鉅變，值此內憂外患之際，美國人迫切需要一種新的邊疆。馬漢的海權學說及其他理論雖然在外交和國防方面提供了某種方向，但要找到一個能夠代替傳統邊疆的新邊疆，為大多數美國人所接受和可以使用的新安全閥尚需時日和檢驗。最終成為新邊疆和安全閥的是體育。

二 體育成為美國的新邊疆

如果大家閱讀美國歷史著作，我們會發現絕大多數學者都強調戰爭、外交、市場等因素在後來美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認為這就是美國進入二十世紀後的新邊疆。^④很少學者注意到體育在美國擴張歷史中的重要性。其實，體育在某種程度上被當時的社會思潮和時代的弄潮兒打造為美國的新邊疆和美國人的新安全閥。體育的橫空出世並成為新安全閥，不僅是時代使然，也是美國國內外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帝國主義、天定命運等思潮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產生巨大影響，與美國人對體育的推崇無疑是相得益彰、相輔相成的。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曾寫道，“真正的競技運動與公平競爭毫不相干。它注定充斥仇恨、嫉妒和狂妄自大，人們無視任何規則，面對暴力竟然產生病態的愉悅感。換句話說，競技體育就是沒有硝煙的戰爭”。^⑤從某種意義上，奧威爾的體育定義同美國利用體育擴張和推廣美國文明和文化是完全契合的。

①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 174.

② 詳見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③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0);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1793-1812*,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2);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mpany, Limited, 1897).

④ 「邊疆」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人思考重大國策的一個重要名詞。約翰·甘迺迪在1960年接受民主黨提名成為總統候選人的演說中，提到美國面臨的各種新挑戰和新問題，他稱之為美國「新邊疆」。他在演說中向美國人呼籲，“I am asking each of you to be pioneers on that New Frontier. My call is to the young in heart, regardless of age-to all who respond to the Scriptural call: “Be strong and of a good courage; be not afraid, neither be thou dismayed.”演說的原始文件可在位於波士頓的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所藏的Papers of John F. Kennedy Pre-Presidential Papers. Senate Files, Box 910裡找到。題目是“The New Frontier: acceptance speech of Senator John F. Kennedy,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July 15, 1960.”

⑤ George Orwell, *Shooting an Elephant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0), p. 153.

在美國最早提出體育可以成為美國新邊疆的是1910年接替特納在威斯康辛大學位置的歷史學家佛瑞德里克·帕克松 (Frederic Logan Paxson, 1877-1948)。帕克松是特納邊疆學說的忠實信徒，他於1932年在美国歷史學會演講時，宣稱特納的邊疆學說自1893年問世以來，迄今已40年，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不用更正，不容駁斥 (he needs no correction, nor can he be refuted)”^①。其實他本人也是邊疆學說的重要學者，其主要邊疆史著作為『美國最後的邊疆』 (*The Last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0)、『美國邊疆史：1763-1893』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763-189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4) 以及『當西部消失的時候』 (*When the West is Go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0)。其中『美國邊疆史：1763-1893』一書獲得1925年度普立茲歷史著作獎。帕克松接替特納在威斯康辛大學一直任教到1932年，然後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任講座教授。1938年他當選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有趣的是，1938年12月29日他發表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演說的地方就在芝加哥，而1893年特納也同樣是在芝加哥舉行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發表了邊疆意義的報告。

在1917年，帕克松已經是一位受人尊敬和有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他當選了1916-1917年度的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該組織成立於1907年，當時在美國學術界地位很高，為美國歷史學者的著名組織。1965年其更名為the Associa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名至實歸。1917年4月26日帕克松就任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時在芝加哥所作的主席演說的題目就是『體育的興起 (The Rise of Sport)』。同年九月在學會的學術刊物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正式發表。^②在分析該文之前，我不禁想起毛澤東於1917年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其生平第一篇文章，題目恰恰是「體育之研究」。^③真是無巧不成書，反映了中美兩國歷史軌跡的神奇交集。更巧合的是帕克松當時係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教授，無獨有偶，該校也是當年特納發表邊疆的歷史意義一文時任職的地方。帕克松發表其「體育的興起」主席演講的城市又是芝加哥，前面提到，芝加哥也是1893年特納發表其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論文的地方。

之所以不厭其煩的提到這些巧合，其實是為了說明「體育的興起」與特納的邊疆學說的密切關聯。帕克松的這篇文章的構思和觀點無疑並非一時興起，而是深思熟慮之作，完全是1893年特納發表其著名論文的氣勢與思路。帕克松當然在這篇文章裡對特納的邊疆學說高度讚賞，稱特納的邊疆學說是近半世紀美國歷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 (the most distinguished feat in Americ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帕克松呼籲現在是尋找新邊疆的時代。在文章一開始，帕克松寫道，“目睹舊邊疆消失的這一代美國人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巨變”。“自由土地用光了。牧場衰落。社會安全閥吃緊，但並未爆炸。工業社會造成的與日俱增的壓力並未引起社會全面崩潰。原因是一個新安全閥出現了。”在他看來，新邊疆就是體育。作者認為，美國之所以在舊邊疆消失後仍充滿活力，原因在於一個新的社會安全閥出現。體育在19世紀末在美國迅速興起就是新安全閥。體育改變了美國社會，為其增添了活力和安全閥。體育就是新的美國人的邊疆生活。棒球在各地出現，體育俱樂部、體育設施、體育用品的問世，讓美國人得以從事體育、享受鍛鍊。體育的登場正好填補了舊邊疆的剛消失所帶來的衝擊。體育作為安全閥在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被設計出來並得以實施 (the safety valve of sport was designed built and applied)。帕克松進一步認為體育取代邊疆作為安全閥的功能在於體育可以促進公共福祉、修復國家內戰後的創傷、減輕鍍金時代的各種腐敗和罪惡，增加民族活力、健康和動力。帕克松甚至明確宣稱，體育

① Paxson, “A Generation of the Frontier Hypothesis, 1893-1932,” in Frederic Logan Paxson, *The Great Demob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41), p. 40.

② Frederic L. Paxson, “The Rise of Sport,”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4, No. 2, 1917, pp. 143-168. 該文後來作為帕克松的代表性文章收入Frederic Logan Paxson的 *The Great Demob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 一書。

③ 毛澤東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以「二十八畫生」一名發表這一文章。二十八畫生：「體育之研究」，『新青年』3-2 (1917.4.1)。

就是新邊疆，是一個開放的、充滿活力的邊疆。體育代替昔日的邊疆生活，讓工業化、城鎮化的美國避免老化和走下坡路。他認為，美國人在國際上的體育之爭實乃尋求和構建新邊疆。體育競技場就是美國人在新時代下的新邊疆。體育代替傳統的舊邊疆，可以成為美國人的新安全閥（the safety valve of sport），讓美國人得以藉此釋放能量和尋求國家的偉大和安全。美國人會在這場新邊疆之爭中獲勝，從而在新世紀中建立“新世紀的新美國主義（a new Americanism for a new century）”。^①

如同當年西奧多·羅斯福成為特納的知音一樣，帕克松在該文中高度讚揚羅斯福，認為西奧多·羅斯福就是這種新安全閥的代言人和代表，其影響到處可見。的確，帕克松對羅斯福的評價不無道理。就在特納提出著名的邊疆學說的1893年，羅斯福就敏銳的注意到，體育在19世紀末成為美國流行的新優勢，為美國注入新的活力。羅斯福生於1858年，一生飽受氣喘和氣管炎折磨。但他大力鼓吹鍛鍊和朝氣蓬勃的生活，通過體育強身健體。他喜歡打獵、運動，崇尚西部邊疆，迷戀戰爭，認為運動和戰爭是個人和國家活力的體現。他沒有趕上內戰，對於其父未能直接走上內戰戰場也略有微詞。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後，他立即從政府辭職，走向古巴戰場，以勇敢、善戰聞名一時。因為擔心美國白人人種的墮落，羅斯福等人大力提倡體育、奮鬥的人生。並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歇斯底里的情緒、優勝劣敗、對外擴張等思潮的影響力。羅斯福在懷念舊邊疆的消失時，固然感嘆所謂邊疆精神的離去。但他認為美式橄欖球可以成為當年幫美國人戰勝西部的現代替代品。體育可以是新邊疆，舊邊疆帶走的安全閥可以從體育比賽中獲取。^②用羅斯福的話說就是“總而言之，人生如同橄欖球比賽，應遵循的原則就是，全力以赴達到目標，不要犯規，不要膽怯，但要實現目標！”^③

怪不得羅斯福是美國體育的著名代言人。他是1904年美國奧林匹克運動會榮譽主席。1905年哈佛大學傳奇校長伊力特（William W. Eliot）鑒於大學橄欖球比賽的暴力傾向，威脅哈佛要退出橄欖球比賽項目。羅斯福對此深為不滿，並以總統之尊，出面調停。1905年10月9日他邀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代表到白宮，討論如何在橄欖球比賽中減輕傷害，但新規則應不會讓橄欖球比賽“淪為女士的比賽為要（not on too ladylike a basis）”。^④羅斯福熟知奧林匹克理念。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任國際奧委會主席期間，曾邀請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出任1904年芝加哥奧運會榮譽主席。他回答說，他將以最大的熱忱承擔此任，並將傾盡全力使芝加哥奧運會取得成功。羅斯福的信“洋溢著最熱烈的語氣。他提到顧拜旦男爵在體育方面的工作，可以看出總統對之有所了解”。順便一提的是，芝加哥後來放棄了1904年奧運會主辦權，由聖路易市接替。第二年羅斯福因在日俄戰爭中的作用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這同一年，他與挪威探險家弗里德約夫·內森（Fridtjof Nansen）一起獲得了國際奧委會頒發的奧林匹克榮譽證書。^⑤

就在特納發表邊疆學說的同時，芝加哥於1893年舉辦世界博覽會。博覽會不僅展示一個充滿活力的偉大美國正在崛起，還大力弘揚所謂白人文明中的雄性文化價值，揭示非白人文明缺乏活力和陽剛之氣。^⑥189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更是向世人宣告一個技術先進、大眾文化發達的新型大國——美國的誕生。根據體育文化學者馬克·德瑞松（Mark Dyreson）的研究，他發現該時期出現了所謂美國體育傳教士（America's athletic missionaries）。這些人強烈宣傳體育的

① Frederic L. Paxson, "The Rise of Sport," pp. 143-168.

② 關於羅斯福的奮鬥人生及生平，著作甚多。與本主題相關的最近著作可參考Kathleen Dalton, *Theodore Roosevelt: A Strenuous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2002).

③ 原文為“In short, in life as a foot-ball game, the principle to follow is : Hit the line hard; don't foul and don't shirk, but hit the line hard!” Roosevelt, “the American boy,” in Roosevelt, *Strenuous life*, p. 137.

④ Kathleen Dalton, *Theodore Roosevelt: A Strenuous Life*, p. 290.

⑤ 詳見Wolf Lyberg, ed., *The IOC Sessions, 1894-1988*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p. 35.

⑥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 35-36.

重要性，強身健體的重要性，以及體育對美國的重要性。當時在美國極富盛名和影響力的約書亞·斯特朗（Josiah Strong）神父就十分強調美國人要有強壯的身體。他說，除非美國男子有強壯的體格，否則美國社會就無法得到拯救。^①當時鼓吹體育重要性的一個共同認知就是體育可以增加美國的民族凝聚力，促進民族認同、提高文明價值。德瑞松就發現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不少學者甚至中產階層人士認為體育是實現美國自我認同的重要媒介。一個追求自強不息、強身健體的美國民族可以促進社區建設，產生歸宿感和認同感。^②專門研究1880-1920期間美國人陽剛之氣和體育關聯的一位學者注意到，在1880年到1920年間美國出現了鼓吹陽剛基督教的現象。^③顯然，體育與美國的擴張文化和文明密切相連。正如英國著名學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所寫的，傳統是建構和想像的產物。無疑，體育透過美國人的建構和想像成為美國文化和文明的獨特的組成部分。^④

三 美—西戰爭與美國人對陽剛之氣的追求

體育成為美國中產階層和菁英眼中的新邊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對其文明活力和國家能力的思考。美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汀·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在其『為美國的男子氣概而戰』一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社會當時對“尚武精神”的認同和熱衷。在霍根森看來，各國向來強調男子氣概是國家生存和競爭之道，而體育運動則被認為培養男子氣概的捷徑。本文前面曾提到，對羅斯福、馬漢等人而言，男子氣概、陽剛氣質、奮鬥人生（strenuous life）是美國強大的保證，是美國文明之所以能夠自立於世的根源，是邊疆文化的反映，更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中的優勝劣敗的體現。歷史學家注意到，19世紀末許多美國人同羅斯福、馬漢等人一樣，非常強調男子氣概、陽剛氣質，羅斯福、馬漢等人重視奮鬥人生無疑有肥沃的土壤，並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響應。^⑤

19世紀末美國不少所謂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認為工業化和現代化下的美國需要強壯的美國人。普里斯·科里爾（Price Collier, 1860-1913），畢業於哈佛大學神學院，以研究歐洲人眼中的美國民族性的系列著作出名。他在20世紀之交不遺餘力地向美國人宣傳體育與國家命運的密切關聯。他說，崇尚和從事體育讓美國人可以在精神和體力層面強大，可以幫助美國更好應對20世紀後國內和國際上會出現的各種挑戰和危險，並有效對抗美國人面臨的宗教和道德上的各種不良誘惑。換句話說，體育可以成為拯救個人和國家的有效工具，他呼籲美國人應該致力於培養強壯的身體、著眼於公平比賽，並力爭勝利。^⑥

霍根森認為，美國之所以在1898年同西班牙兵戎相見，打了一場所謂“光榮的小型戰爭（splendid little war）”，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少美國人擔心美國男人的陽剛之氣（manhood）。如果美國男人無所事事，遊手好閒，手無縛雞之力，這個國家就會遭殃。因此美國人決心要為美國的陽剛之氣打一仗。一個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可以讓美國振作起來，讓民眾充滿朝氣和活力。她在書中指出，馬漢當時就號召美國政府要有男子漢決斷之氣而不要優柔寡斷婦人之仁，要敢於鬥爭和戰鬥。馬漢認為，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缺失是導致其文化消亡的最大危險。尚武精神源自於陽剛之氣。當然，陽剛之氣的培養則來自體育。對文化強權的嚮往，導致同時期的美國人追求尚武精神和對運動的熱愛。1890年代晚期馬漢更是明目張膽地宣稱，“對文明社會來說，沒有比

① Ronald T. Takaki, *Iron Cages: Race and culture in 19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 263.

② Mark Dyreson, “‘America’s Athletic Missionaries’: Political Performance, Olympic Spectacle and the Quest for an American National Culture, 1896–1912,”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25 (2), 2008, pp.185-203.

③ 詳見 Putney, *Muscular Christianity: Manhood and Sports in Protestant America, 1880-1920*.

④ Eric Hobsbawm,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99-300.

⑤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pp. 10-11.

⑥ Price Collier, “the Ethics of Ancient and Modern Athletics,” in Benjamin A. Heydrick, ed. *Forum Papers: First Series* (New York: Duffield and Company, 1924), pp. 17-33.

尚武精神（我敢說是“戰爭”）的消失損失更大的了”。^①來自麻省的著名共和黨參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1850-1924）是20世紀之交頗具影響力的美國政治家，也是羅斯福的密友和政治盟友。他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大力鼓吹喚醒美國人的尚武精神和支持美國的好戰政策，認為兩者密切相連。洛奇明確將體育運動和國家建設聯繫在一起。他在1896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時舉行的晚宴致辭中充分強調體育對培養學生頑強追求勝利和高尚品質的重要性。他督促母校哈佛大學要重視和支持與體育運動相關的項目，因為“花在體育比賽上的時間和在運動場上受的傷，是說英語的民族成為世界征服者所付代價的一部份”。^②

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曾指出美國人經常經歷心理危機（the psychic crisis），在19世紀末尤其如此。他認為美—西戰爭是美國人心理危機的一個反應和結果。^③霍根森的著作也佐證了這一點。她在書中詳細分析了當時美國朝野對於戰與不戰的辯論。當時的好戰者指責反戰者為婦人之仁和缺乏男子氣概。他們甚至攻擊當時舉棋不定的麥金萊總統沒有脊樑骨，缺乏男子氣概。像羅斯福這樣的人擔心美國政治女性化。而打仗則可避免美國墮落和增強美國的男子氣概。換句話說，打仗有助於美國的民主社會，因為一個缺乏男子氣概的民族是無法維持民族秩序的。在19世紀末，因為他們經歷了邊疆的消失，導致美國人產生男子氣概危機。麥金萊在1896年競選總統時也宣稱，“我們絕不奉行有損害美國男子氣概的政策”。“如果我們讓美國男子氣概受損，那麼美國的民族受損，最後美國這個國家也會受損”。^④羅斯福在1895年底寫給亨利·卡伯特·洛奇的私人信件中表示他對哈佛大學某些人主張的和平主義深惡痛絕，“我希望戰爭早日來臨，因為我覺得這個國家需要一場戰爭”。^⑤一位參議員直接把可能的美國人對西班牙戰爭與體育相提並論，稱其“Splendid sport, indeed! How chivalric!”^⑥這裡體育、尚武精神、男子氣概透過美—西戰爭得到完美體現。聯邦眾議員David A. De Armond的言論充分反應了這一點。他說，美國人的好戰是美國人陽剛之氣的反應。另一位眾議員在鼓吹戰爭的時候，告誡其國會同事，“讓我們像一個男人。讓我們履行男人的職責”。^⑦美—西戰爭是一場受美國人歡迎的戰爭，美國人踴躍參戰。39歲的羅斯福甚至立即辭去政府職務，義務到古巴參戰。亨利·瓦特生（Henry Watterson）在古巴戰爭剛結束，立即出版了長達近500頁大開本的『美—西戰爭史』（History of the Spanish-American War）一書。他在書中寫道，美—西戰爭中物質方面對美國的貢獻不大，其最重要的貢獻幫助美國人提升和擴大其國家視野，尤其是“提昇、推廣和激勵了新一代美國人的男子氣概”。^⑧

體育作為新邊疆和新安全閥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其兼容並蓄特性。好戰份子擁抱體育，反戰人士也樂於接受。美國著名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對體育的重要性評價很高。他自稱是和平主義者。^⑨同羅斯福等人不一樣，他不熱衷戰爭，相信人類最終能夠實現和平共處，認為戰爭能夠毀滅文明。但人類文明需要活力和奮鬥的人生觀，這些正能量如何來？他的答案是體育。他在1910年發表的一篇名為「戰爭的道德替代品」（“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的文章裡直指體育可以成為戰爭的替代品。必須指出，詹姆斯在文章中並沒有用體育這個詞，而是使用的martial virtues、civic temper、physical fitness和the martial type of character等名詞。儘管如此，

① Hoganson,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p. 36.

② Lodge's speech at the Alumni dinner, Harvard Commencement, June 1896, in Henry Cabot Lodge, *Speeches and Addresses, 1884-190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9), p. 293.

③ Richard Hofstadter, "Cuba, the Philippines, and Manifest Destiny," in Hofstadter,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p. 145-187.

④ Hoganson,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p. 29.

⑤ "Roosevelt to Lodge, December 27, 1895," in Brand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p. 113.

⑥ 轉引自Hoganson,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p. 68.

⑦ Hoganson,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p. 78.

⑧ Henry Watterson, *History of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Indianapolis: W. W. Douglas, 1898), viii.

⑨ William James, "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i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 Alternative Use of Force*, No. 224, 1926, p. 46.

詹姆斯的尋找戰爭代替能量的觀點同當時美國風行一時的體育觀是吻合的。在詹姆斯看來，戰爭固然是不義，但通過其他途徑把人類的多餘能量和爭強好勝的本能激發出來，則是道德的。人們可以把參戰的衝動和能量透過奮鬥的人生觀、體育比賽和活動化解。他認為人類如果通過激發和培養人們的martial virtues、civic temper、physical fitness和the martial type of character而不是利用不義和毀滅性戰爭，我們不僅可以藉此提供民族正能量，還可以增進民族凝聚力和社會和諧。^①在一定程度上，詹姆斯其實是在說過去人們把戰爭當成歷史發展的動力，他這裡建議的戰爭替代品其實可以視為新邊疆及美國人發洩能量的新安全閥。有學者甚至指出詹姆斯不僅主張體育可以是戰爭的道德替代品，還可以是思想與行動之間的紐帶。^②詹姆斯的主張同當時的『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 主編的想法不謀而合。『大西洋月刊』的編輯們不遺餘力的宣稱體育是系統培養簡樸、奮鬥人生的唯一途徑，唯一可以代替戰爭的道德選項。就幫助年輕人發洩多餘能量而言，體育是最有效、最全面的手段。^③

在本節我借鑒了霍根森不少有關男子氣概之爭導致美—西戰爭的觀點和證據，目的就是想利用其極有說服力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來佐證本文所要論證的體育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成為美國新邊疆的事實，強調體育在19世紀末以來作為新邊疆已經成為美國社會各階層廣泛共識。如果說對尚武精神及男子氣概的追求直接導致美—西戰爭的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完全可以認為美國人當時對尚武精神及男子氣概的追求一舉把體育打造為新邊疆。19世紀末以來美國人通過把運動打造為新邊疆，通過棒球、橄欖球、籃球等計畫建構美國、想像美國，把美國人與國家、把文化與外交政策等密切聯繫在一起，並通過體育將美國文化、思想、價值擴張到全世界。體育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通過媒體、比賽、全國聯賽等形式打造新美國，成為美國新邊疆。這一邊疆充滿彈性，充滿張力和活力。誠如體育文化學者馬克·德瑞松在其極其優秀的著作『打造美國隊』(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裡所寫的，通過體育比賽而建構的美國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將體育打造為美國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份，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人的重要追求和實驗。^④

四 透過體育擴張和傳播美國夢

美國儘管在美—西戰爭後並沒有直接走向外交和軍事上擴張之路，但通過體育傳播美國夢和文化、文明擴張卻如火如荼的展開。棒球被認為起源於美國，一些學者宣稱1839年在紐約州的Cooperstown即開始，被譽為美國國球。^⑤棒球運動自1890年以來日益增長和發展，到1919年影響力如此之大，導致美國著名體育記者休·佛樂童(Hugh Fullerton) 當年寫道，棒球是美國的國球，對世界美國化貢獻最大(is the greatest single force working for Americanization)。^⑥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體育無疑為打造美國民族大熔爐和美國夢提供了最好的途徑。的確，不論是新移民，還是出生在美國的人，不論你是什麼背景，大家都可以藉助棒球成為美國文化和文明的一部份，認同和建設美國。不少體育項目被認為是美國的象徵，如棒球就有美國國球之譽(national pastime)。美國著名詩人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 就堅信棒球是“我們的遊戲，美國的遊戲(our game, the American game)”。^⑦美國職棒的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 於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後的100週年時(1876年) 建立，不僅可謂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也發人深

① James, *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pp. 43-54.

② Donald J. Mrozek, *Sport and American mentality, 1880-1910*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3), pp. 229-230.

③ Dyreson, *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pp. 195-196.

④ Dyreson, *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p. 186.

⑤ 關於棒球的早期歷史及在美國的流行，請參閱Johnnie Evers and Hugh S. Fullerton, *Baseball in the Big Leagues* (Chicago: The Reilly & Britton Company, 1910).

⑥ S. W. Pope, *Patriotic Games: Sporting Traditions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1876-192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3.

⑦ Martin C. Babicz and Thomas W. Zeiler, *National Pastime: U.S. History Through Baseball*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7), Foreword, vii.

省，不禁讓人思考100年前追求的主權獨立與100年後美國人追求的文化獨立和自我本位是否有某種密切聯繫。許多美國人及學者都認為，要理解美國社會或美國史，人們必須至少要重視棒球。歐洲出生但長期生活在美國的著名文化史和哲學學者雅克·巴尊（Jacques Barzun, 1907-2012）甚至有一句名言，“要想真正懂得美國人的真實想法，就要懂得棒球”。^①

美國歷史學者史蒂文·韋恩·波普（Steven W. Pope）曾考證，從1876（獨立戰爭一百年）到1926（獨立戰爭150週年）年間，體育文化在美國社會生根發芽並不斷壯大。1920年大多數美國人相信體育是多元化美國社會的巨大凝聚力。^②奮鬥的人生必須是健康的人生、體育的人生。體育就在此時應運而生，成為美國人的新邊疆。十九世紀末美國人之所以崇尚體育，在某種程度上與尋求新邊疆有關。體育可以代替邊疆人的生活，讓人充滿向上和不甘享受的動力，讓美國人藉助運動尋求新邊疆。工業化、都市化固然有讓人安於享受的誘惑，但也可以讓大家有閒和動力參與體育鍛鍊，並讓大家組織起來，為建立體育設施、組織體育俱樂部和比賽提供更大可能。交通的便利性也是一個優勢，因為交通的便捷讓美國人更容易參加和觀賞大型比賽。就是在這種語境中，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美國人特別是中產階層越來越重視美國的雄性文化和體育。正是在這一環境下，根據歌爾·貝德曼（Gail Bederman）的研究，美國英語中的男子氣概（masculine）直到1890年代才成為日常詞彙的。^③

體育成為新邊疆得到美國全社會的參與。如同傳統邊疆讓各種人尋求發展、解脫的機會一樣，體育為美國各階層、機構、團體提供了與時俱進的機會。體育首先成為美國用來訓練部隊戰鬥力、培養領袖才能和團結合作以及吃苦耐勞的品德的手段。根據不少學者的研究，1890年前，體育比賽和體育鍛鍊在美國的軍隊裡受到不少限制。但1890年開始，首屆美國陸軍與海軍橄欖球對抗賽無疑開啟了體育的新時代。它不僅成為傳統，更是一個強烈的信號。體育成為美國軍人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這一勢頭一發不可收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基督教青年會直接接管美國軍隊中的體育項目，在一戰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軍人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體育幹事在部隊中開展的體育項目。感恩節是美國的傳統節日，本來與體育沒什麼關聯。但在19世紀末感恩節與橄欖球比賽連在一起，凡感恩節必有橄欖球比賽。吃火雞、家庭團聚與看體育比賽成為這一神聖傳統節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份。1919年美國西點軍校與海軍學院之間在感恩節當天的橄欖球比賽吸引了45,000名觀眾現場觀看。『紐約時報』也發表了系列文章介紹和評論這場比賽。該報甚至稱“整個1919年橄欖球比賽季是美國橄欖球史上最有紀念意義的一年”。^④

體育也是美國學校用來培養學生品行和領導力的手段。耶魯與哈佛大學及其他大學之間各種比賽，棒球、橄欖球、籃球等在19世紀末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美國的大學更是體育成為新邊疆的推手和積極參與者。傑姆斯·康諾利（James B. Connolly）是在1896年希臘雅典舉行的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拿第一塊金牌的美國人，他當時就是哈佛大學的學生。美國媒體也在打造體育作為美國的新邊疆上做出巨大貢獻。1895年，美國著名媒體人威廉·蘭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其報系首次開闢體育專欄。很快美國其他重要報紙跟進，開始出版體育系列，從此體育欄成為美國報紙的一大看點。

體育成為美國人的新邊疆還與現代運動的興起特別是奧林匹克運動的出現密切相關。當然美國當時出現的重視體育和提倡健康生活的想像，與在19世紀中葉在英國出現的基督教青年會和19世紀末法國人顧拜旦發起的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相契合。基督教青年會很快在美國發揚光大，並成為美國體育運動的重要推手。美國人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建立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並成

① Jacques Barzun, *God's Country and Mine: A Declaration of Love Spiced with a Few Harsh Words* (Boston: Little, Brown, 1954), p. 159.

② Pope, *Patriotic Games*, p. 3.

③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and Civilization*, p. 18.

④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 1919, section III, p. 1.

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先鋒，利用國際體育展示美國文化和文明的優勢。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教授威廉·米利甘·斯隆（William Milligan Sloane）是第一批國際奧委會委員。如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約翰·麥克阿隆（John MacAloon）所說的，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成為美國人的精彩絕倫的表演（a spectacle par excellence）。^①

自19世紀末以來，體育成為美國人的新邊疆，一戰終於讓該邊疆合法化。一戰同時也讓體育更普及化和大眾化。麥克·威藍（Mack Whelan）在一戰爆發前預計，奧運會可能引導德國崇尚戰爭的心態轉移到足球。他甚至希望美國人打造體育作為戰爭的道德替代品可以把世界帶入人類文明史的新時代。^②一戰期間的法國戰地記者喬治·樂克提爾（Georges Lechartier）明顯捕捉到體育與美國參戰的關聯。他寫道：“雖然該國參戰固然出於高尚理想，美國人畢竟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但更重要的而且是決定性動機還是出於美國人對體育的熱衷”。在樂克提爾看來，美國人的公平競爭的體育情結讓美國人對德國使用潛水艇從而破壞公平遊戲規則感到十分惱怒，因此決定參戰以懲罰德國。^③這種說法固然有點牽強附會，但也說明其意識到美國人對體育的重視和強調體育在美國外交中的重要性。

顯而易見的是，到了一戰結束後的1920年，雖然美國人拒絕了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所弘揚的美國要成為外交和政治上的世界霸主和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但經過30年的發展和成長，體育得以成為美國全社會所接受的新邊疆，體育在美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得到完全確立，並且發揚光大繼而根深蒂固。美國人通過體育和文化向全世界擴張的野心和圖謀，似乎達到了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把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成功推向全世界。從1920年迄今的一百多年以來，體育在美國社會和文化中的重要性已經無人質疑，並成為美國軟實力和展示美國夢的重要手段和媒介。試問，1891年起源於美國的籃球運動及其NBA、二十世紀以來在美國轟轟烈烈、如火如荼開展的棒球、高爾夫球、美式橄欖球運動等，有哪一項沒有打上美國的深刻烙印，並讓全世界認識一個充滿活力和張力的美國呢？如果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世界上不折不扣的霸主，我們應該意識到19世紀末到一戰結束期間體育無疑為美國的未來政治、外交和軍事擴張打下堅實基礎。沒有長達半個多世紀借助體育作為軟實力把美國文明、文化、價值觀、經濟等推向全世界，美國在二戰後走向政治、軍事、外交超級大國的地位就很難如此順理成章得到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接受和支持。換句話說，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體育作為美國的新邊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領袖和超級大國打下了堅實基礎。

五 簡短的結論

本文的出發點及旨趣是藉助體育研究美國的文明內涵和擴張特質。在本文一開始，我就開宗明義，提及學術界對美國是否例外和美國人是否長期以來並不願意成為世界領袖的問題。在文章快要結束時，我希望已經講清楚美國人如何在20世紀之初，把體育打造為新邊疆，並通過體育向全世界證明自己其實是天選之民，通過體育展示自己的優越地位和向全世界擴張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價值觀。其實全世界所有國家和民族中，很少有像美國人這樣長期糾結男人的陽剛之氣。如同美國人週期性討論美國是否衰退問題一樣，美國人也週期性糾結美國人的陽剛之氣問題。羅斯福在20世紀初公開強調陽剛之氣與國家的關係（manhood and statehood）。^④美國傑出歷史學家後來成為約翰·F·甘迺迪總統顧問的小阿瑟·斯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1958年就在美國有影響的男性雜誌『君子』（Esquire）雜誌上公開撰文指出，美國男人的陽剛之氣或男子氣概

① Dyreson, “‘America’s Athletic Missionaries’: Political Performance, Olympic Spectacle and the Quest for an American National Culture, 1896–1912,” p. 188.

② Dyreson, *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p. 179.

③ Dyreson, *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p. 200.

④ Roosevelt, *Strenuous Life*, pp. 201-214.

正經歷危機，認為美國男人的自我定位出現了嚴重錯位。^①1999年曾榮獲普立茲獎的美國著名女記者蘇松·法魯迪 (Susan Faludi) 以各種事實和採訪報告證明在新世紀之交美國人的男子漢形象處於四面楚歌之中 (manliness remained “undersiege”)，認為美國男人自我感覺無能、無助，成為長不大的男孩 (man-boys)，無法面對現實，陷入男性陽剛之氣危機。^②就是最近幾十年，在美國呼籲關注美國男子氣概議題的著作也比比皆是。這裡僅提及幾本有代表性書籍。最新的一本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加希·豪利 (Josh Hawley) 在2023年出版的書名為『男子漢：美國目前需要的雄性美德』 (Manhood: The Masculine Virtues America needs)。2018年喬丹·皮特森 (Jordan Peterson) 的著作『人生的12條規則』 (12 Rules for Life) 問世。2006年哈佛大學著名的保守政治科學家哈維·曼斯菲爾德 (Harvey Mansfield) 出版『男子氣概』 (Manliness)。1990年羅貝特·貝萊 (Robert Bly) 的『一本關於男子漢的書』 (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 在冷戰一結束即粉墨登場。^③這些著作明顯反映美國人對所謂男子氣概和陽剛之氣的擔憂和關注。如果說21世紀的今天美國人還如此耿耿於懷於男子氣概，我們對一百多年以前的美國社會對陽剛之氣的情有獨鍾則完全可以理解了。^④

本文聚焦1890-1920年這一美國歷史發展與進程的重要歷史時期，並通過體育這一視野，旨在證明美國在這一時期已經明目張膽、大張旗鼓的進行文化擴張、文明擴張，一舉把體育打造成為新邊疆和新美國夢。本文還想說明通過體育角度解讀美國歷史，可以進一步認清美國從19世紀末以來通過文化、文明特別是體育弘揚美國價值及美國夢這一訴求和做法是一以貫之的。美國人對男子氣概、陽剛之氣、尚武精神的糾結和培養也是一直耿耿於懷和長盛不衰的。只有認清和理解這些我們經常視而不見、長期忽視但極其重要的現象，我們對有關美國的歷史、美國文明、美國是否衰落以及美國擴張等議題才有較為透徹的理解。如果本文有什麼真正意義和價值的話，恐怕還是在這點上。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認清體育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對中國研究美國史的學者和外交決策者尤其重要。一是體育視角是幫助我們理解美國歷史的一個極好途徑，二是想說明美國的外交決策長期以來一直受多方面制約，美國人對男性氣概、尚武精神的強烈和一以貫之的追求，也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但這一因素在大家思考美國外交政策時往往被忽視。其實，就中美關係而言，我在其他地方多次提到，體育也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內容。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幹事早在1895年開始就大力向中國人推薦體育，1932年劉長春單刀赴會洛杉磯奧運會，1971年中美通過乒乓外交實現中美外交關係解凍和突破，1984年中國人在洛杉磯運動會首奪金牌，2008年美國總統親自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等等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⑤2028年洛杉磯將會第三次舉辦夏季奧運會，會不會在中美關係上再次發揮作用，讓我們拭目以待。

[責任編輯：黃奇琦]

①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risis of American Masculinity”, *Esquire*, vol. 50, no. 5, 1958, pp. 63-64. 後收入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Politics of Hope* (Cambridge, MA: Riverside Press, 1962), pp. 237-246.

② Susan Faludi, *Stiffed: 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Ma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9).

③ Josh Hawley, *Manhood: The Masculine Virtues America Needs*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23); Jordan Peterson, *12 Rules for Life: An Antidote to Chao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8); Harvey Mansfield, *Manlin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bert Bly, *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 (Boston: Addison-Wesley, 1990).

④ 2023年夏天美國兩位企業鉅子Meta企業的創始人馬克·祖克柏 (Mark Zuckerberg) 與Tesla企業的創始人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之間因商業糾紛和競爭等因素計劃兩人公開打一架，一決雌雄。兩人無論從何種角度都屬非常成功人士，正常意義上講，他們的成功已無需證明。但居然想通過身體肉搏證明誰更優秀，更「爺們」。由此可見美國社會在21世紀的今天還是充滿財富不代表陽剛之氣，成功也不等同男子漢氣質的認識。此事通過媒體在全世界鬧得沸沸揚揚，因此把美國社會對陽剛之氣的熱衷再次推到風口浪尖，在全世界受到關注。其實，對男子漢形象的熱衷在其他國家也存在。例如2012年加拿大人賈斯汀·杜魯道 (Justin Trudeau) 為了問鼎總理寶座，一洗自己的官二代及奶油小生形象，公開同當時的加拿大參議員派屈克·巴拉祖 (Senator Patrick Brazeau) 打了一場拳擊比賽，以證明他能打能贏。結果獲勝。三年後順利成為加拿大總理。俄國總統普京也常公開展示自己的硬漢形象。

⑤ 詳見拙著：『奧林匹克之夢：體育視野下的中國與世界，1895-2050』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拙著：『體育與中美關係的歷史發展：紀念乒乓外交50週年』，『美國研究』3 (2021)：13-27；拙著：『中國人與美國人：從同舟共濟到競爭對決，一段被忽視的共有歷史』 (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8)，鍾沛君譯；拙著：『國際體育與中國的國際化及外交戰略』，後收入魏楚雄等主編：『東西方文化與外交論文集』 (澳門：澳門大學出版社，2013)。